

# 文化深度介入城乡一体化

## ——中国“城市化”模式的一个显著特色

孙若风

借助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强力推进,全国范围内的城乡一体化势如破竹,最近统计表明,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超过50%。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一个文明古国,面对如此急速的转变,学界始终在文化上怀有强烈的忧患与期待,各级政府也在统筹城乡发展中纳入了文化考量。文化对城乡一体化的深度介入,有可能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一个显著特色。

文化介入中国城乡一体化最显性的表现,是文化在各级统筹城乡发展的规划中成为必不可少的内容,这可能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中国的统筹城乡发展,实际上有两种含义:首先是统筹城市与乡村的协调发展,同时又统筹城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协调发展,这样,把文化写入规划就成了“规定动作”。事实上在不少地方,统筹城乡发展的规划还没有出台,文化系统已经闻风而动,按照城乡一体化的思路开展探索,既在当地先行一步,也为全国积累了经验。

不只如此,文化还成为一些地方走活统筹城乡发展这盘棋的关键,甚至是整个城乡一体化的轴心。浙江乌镇、成都三圣乡、西安临潼的探索具有代表性。理论上说,任何具备发展文化产业条件的地方,文化都可以在城乡一体化中有更大作为,如果文化产业能够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那么文化也就能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的支柱力量。文化产业作为新兴第三产业,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与产业的辐射力、集聚力相重合,形成了强烈的叠加效应,能够明显促进城乡一体化。而且,文化产业就业需求弹性大,对资金、技术、规模的要求低,进入门槛不高,这正可以成为贯通城乡的产业平台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口。

文化的介入更多还是无形的。首先,文化影响城乡一体化的走向。城乡一体化无可回避城市与乡村各自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这正是文化介入的着力点。以人为本的思想、公平正义的精神、扶助弱势的情怀、城乡共同发展的追求,特别是以牺牲乡村前途和农民利益为代价去实现一时目标的准则,这些理念都决定着城乡一体化的性质和面貌。其次,文化影响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一些地方对二元化体制的改革相对迟缓,惠农政策措施不到位,与思想观念有关,解决了思想问题,就会有紧迫感,就会有效率。文化的参与还将提高农民的素质,营造有利的氛围,促进农业与科技的融合,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市民化。第三,文化影响城乡一体化的方式。文化的介入,是精神、智慧、情感的介入,作用于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作用于领导部门以及当地城市居民的集体意识,使得城乡一体化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都

更加积极健康,也更加协调、全面。

在城乡一体化中文化担纲,是文化对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全面覆盖和深入渗透的一个重要侧面,同时体现了城乡一体化的内在要求。

**首先,转变发展方式的社会背景。**中国启动城乡一体化正值国家确立了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战略,因此,无论是城市经济、农村经济的转型,还是城乡一体化经济的形成,都将注重协调发展和综合推进,注重其中的文化作用,特别是增加文化、智慧和创意的含量,而不能简单地依靠财力、物力的投入,更不是采取高污染、高消耗的办法。文化的介入不是要改变城乡一体化的经济中心,但它要赋予这个过程更多的内容、层次和色彩,特别是赋予文化以灵魂,实现从外延式发展到内涵式发展,从片面发展到全面均衡发展的转变。

**第二,重视文化的传统与现实。**中国是一个重视文化的国度,耕读传家,诗书垂香。近代以来,当中国乡村问题以及背后的社会问题暴露出来,首先引起的是有识之士的文化思考,他们强烈感觉到工业文明给中国乡村、中国社会的继承性和可持续性提出的挑战。新中国成立以来,每次提出解决农村问题,无一例外地强调文化的作用。特别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之后,全党全社会对文化更加重视,统筹城乡文化发展的思路也更清晰。此外,文化产业作为朝阳产业蓬勃兴起,文化的商品属性和经济功能为社会所认识,文化产业推动相关产业发展、促进就业等作用逐步彰显,这也为文化跻身前台提供了新的契机。

**第三,对城乡一体化规律的把握。**城乡一体化的原始动因是经济,但无论是其过程还是结果,都离不开文化,文化现象从来就是与经济现象同步发生的。而且,城乡融合的关键,是文化的最终融合,并且这种文化能够关怀人、陶冶人。这种判断基于对国内外城乡一体化基本规律的认识,也基于对文化的认识。文化的介入将为城乡一体化提供正确的导向和精神动力、智力支撑,促进城乡居民形成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有利于当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有利于保持城市与乡村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并且以这种文化上的两级形成促进当地发展的张力,造就更多的田园城市和美丽乡村。

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在我们前面解决了城乡一体化,创造了各国模式,也提供了有益经验。但从文化的角度反思,其城市文化对农村的强势进入,是不是带来了西方文明的不平衡甚至是现代化的不平衡?至于有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坠入“现代化”陷阱,其民族文化被掏空与乡村文化被淹没同步发生,应该不是偶然。其实,就目前中国的情况而言,强调防止某

一个方面的突进甚至是跃进遮蔽了城乡一体化的矛盾与问题,也并非危言耸听。当今世界,文化引导未来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识和发展战略,中国的城乡一体化正好与这一潮流相遇。自觉发挥文化在城乡一体化中的作用,是中国特色,也是中国的后发优势。

对城市化这一世界性课题,文化介入可能是最具特色的中国解答。从客观效果看,任何国家的城乡一体化都不可能与文化无关。我们的区别是,把潜在的文化角色召唤出来,使文化的能量得以充分开掘、激发和释放——这体现了今天中国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如果说中国的城市化是一次进城赶考,那么文化也将迎接这样的大考。

**一是增强文化介入城乡一体化的意识。**首先要增强有关领导和部门的意识,注重文化作用,加大文化分量,而不是把文化当作累赘和包袱。同时要增强社会意识,让城乡居民都会体会到城乡一体化并不远,就在大家的身边,形成公平正义、团结互助、共同富裕的社会氛围。还要增强文化工作者和文化经营者的意识,跳出“三农”看“三农”,跳出文化看文化,从而找到文化的应有位置和发展空间。

**二是提升文化介入城乡一体化的能力。**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文化发展的基本战略,也是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文化发挥作用的载体和渠道。按照这样的思路,必须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体现公益性、均等性和便利性;在发展文化产业中,培育壮大市场实体,利用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机制,为社会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

**三是寻找文化介入城乡一体化的路径。**一方面探索文化介入城乡一体化的普遍规律,包括介入的方面和介入的方法,充分注意到市场规律和文化规律,实现科学化和规范化,另一方面,各地从自身实际出发,因势利导,寻找用武之地。

从深层次看,城乡分离就是从文化开始的,甚至是文化的产物。马克思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如果说在那次革命性的大分工中文化成了扳道工,那么,如今重建城乡关系,文化又一次介入,使城乡一体化同时成为“城乡文化化”,恰恰是回到了原点,抓住了根本,意义同样重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提出,中国的农村城市化进程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件大事。据此,文化深度介入城乡一体化的模式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人类发展都将产生深刻影响。

(作者为文化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



柯岩同志是当代著名诗人、作家。1949年开始专业文学创作。她出版各种文学著作50多部。主要有:诗集《小迷糊》《阿姨》、《周总理,你在哪里》、《春天的消息》;报告文学《奇异的书简》、《一个诗人眼中的宋庆龄》、《癌症≠死亡》;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他乡明月》、《红蜻蜓》等。其作品有深刻的思想性和独特的艺术个性,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多次获得全国性各种文学大奖,多部作品被译为英、法、德、俄、日及西班牙语等文字。2009年7月,10卷本《柯岩文集》出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共计600多万字。

**我是谁?我是劳动人民培养出来的一个普通写作者,不是精神贵族,不该有任何特权,我只有为在人民歌唱中获得生命;我是我们共和国劳动大军中的普通一员,我必须学习着像工农兵和在基层工作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奉献自己,直至牺牲。**

**我是谁?我是我们祖国密密森林中的一棵小树,我必须像我的前辈老树们那样学习着为人民送去新鲜的氧气、片片绿荫和阵阵清风。**

**我是谁?我是我们祖国无边无际海洋里的一粒小小的水滴,我只有和我13亿兄弟姐妹一起汹涌澎湃,才会深远浩瀚,绝不能因为被簇拥到浪花尖上,因阳光的照耀而误以为是自己发光;如果我硬要轻视或脱离我13亿海水兄弟姐妹,那么,我不是瞬间被蒸发得无影无踪,就将会因干涸而中止生命——**

——引自柯岩《我是谁》一文

# 我是谁?为了谁?

## ——“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暨柯岩作品研讨会”综述

本报记者 高 昌

“在那个硝烟弥漫的岁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和历史诞生了一部关于革命文艺和思想文化的辉煌的科学著作。《讲话》在中国革命文艺运动中第一次明确而深刻地解决了文艺工作中的根本问题,即文艺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问题。”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著名诗人吉狄马加在“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暨柯岩作品研讨会”上发言说。

4月8日,由中国诗酒文化协会、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中国大众文艺学会、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主办的“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暨柯岩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张岳崎、吉狄马加、刘润为、王一桃等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作家和学者近百人出席会议。与会者从《讲话》的精神实质、当代价值,柯岩的创作与《讲话》精神的内在联系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

会议认为,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的历史时刻,重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系统总结柯岩实践《讲话》精神的经验,对于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著名文艺理论家刘润为在发言中指出,70年前发表的《讲话》,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理论创造。它的创造性,它的划时代意义,就在于第一次科学地完整地确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体系。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人,不仅应当是文艺的主要服务对象,而且应当是文艺的主要服务对象。这是对数千年来被颠倒的历史的颠倒,这是与一切旧的文艺观进行的最为彻底的决裂。

吉狄马加强调,《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新文学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文艺新局面的开始。70年来,《讲话》像炽热的火炬照亮了中国文艺前进的道路,像光明的灯塔指引着中国文艺发展的方向。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面对世界性的文化交流与对话,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家,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与多样化等方面,都达到了新的水平、新的高度,这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现实意义上的又一个充分的证明。

与会者认为,70年来,在《讲话》精神的鼓舞、激励和指引下,一代又一代人民文艺家积极投身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从中汲取题材、主题和诗情画意,创造了无数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为中国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了杰出的历史性的贡献,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柯岩是实践《讲话》的典范。

刘润为说:“凡是读过柯岩作品的人都不难看出,她对于笔下的人物,从来不高傲的情感施舍,更不见牧师式的教诲,而是进行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零距离的沟通。”

原装备学院副院长、少将,现北京走进崇高

研究院院长贺茂之说:“柯岩在刚走上文艺创作这个岗位时,有关领导就反复组织他们学习《讲话》,并以自己转变立足点的经历教育他们。她逐渐明确并坚定了‘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之理念和文学艺术要‘为人民群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在6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认真实践。这样才使她在多种形式、浩浩10卷本的创作中没有一首诗、一篇文章是个人感情的浅吟低唱,而都是革命豪情的黄钟大吕;没有一篇是游戏人生或戏说今古,而篇篇都是人生正道或资治史实;没有一处是为自己涂脂抹粉,而处处都是为人民大众立言、立德、立功。概言之,没有一诗一文姑息、放纵假、丑、恶,而诗诗文文俱是歌颂、弘扬真、善、美。”

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卢燕娟认为:“柯岩作为人民艺术家,除了坚持艺术为人民服务之外,她对人民文艺更深刻也更独特的理解,是艺术要塑造人民,艺术家要承担为人民塑造心灵、为社会塑造良知、为民族塑造未来的使命。柯岩的意义,不是在某一种文学流派、语言风格上说的。柯岩,也包括在人民文艺传统中坚持创作的几代人,他们的意义,最根本体现在《讲话》所开创的人民文艺传统中。这一传统是崭新的文化权力关系在中国历史上的崛起,也是崭新的人在中國大地上的涌现。人民文艺传统于这一传统中,不仅为之正名,更为之奋斗。因此,理解这样的艺术家,首先要理解《讲话》,理解《讲话》所开创的人民文艺传统对中国现代历史的深刻意义。”

《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副主编李云雷说:“柯岩是一位‘人民作家’。她的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人民的事业,她的写作是与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人民是她的追求光明与未来的一种方式。在她这里,文学不再仅仅是游戏、消遣或娱乐,而成为了一种精神上的事业。作家不再是旧时代的戏子或文人,也不再追逐商业利益或者个人意义上的成名、成功,而是致力于社会与意识领域的改造,与一种更加宏伟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作家才配得上‘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

著名诗人石祥在发言中深情吟诵他自己创作的诗:“我是谁?在茫茫劳动人民的海洋里,我变成一滴辛勤的汗水,在五谷丰登的田野上,我是一支成熟的谷穗。我是谁?哭着呼唤《周总理,你在哪里》,我是亿万人民眼中的一行热泪;笑着捧出《寻找回来的世界》,我是工读学校教师一片爱的心扉……”

很多与会者在发言中多次引用柯岩的名作《我是谁》。他们表示,学习柯岩同志,把从《讲话》开端的党的文艺主张转化为自觉采取的认识形式和情感形式,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鞠躬尽瘁、添砖加瓦,就是对于《讲话》的最好纪念。

观点摘编

## 完善京剧剧目课口传心授之教学法

戏曲教育从梨园、家班、团带班(大小班)、科班到当代戏曲院校,口传心授约定俗成地成为一种固定的教学方法。教师在进口传心授时,应根据教学对象的差异,有针对性地口传和心授的比例上有所调整。中专教学层次要注重夯实基础,重点强调规范性,在教学中口传要大于心授。本科教学要注意学生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心授要大于口传。

——孙尚琪:《京剧剧目课教学方法之我见》,原载《中国京剧》2011年第8期

## 新中国音乐美学研究中值得思索的几个问题

新中国60年来音乐美学的发展与研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但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索:一、把西方音乐美学理论引入国内,促进了学科发展,但有急功近利、隔靴搔痒、未能理解之弊,或存在着某种误解、理解偏差的现象。如何把各种新的音乐美学理论运用于实践中去,以及如何在审美实践和艺术创作的实践中去把握、选择、检验、发展中国现代音乐美学理论,更新和丰富传统的古典音乐美学理论,是我国音乐美学必然面临的课题。二、在研究方法上,还应该说是单一的方法、量化的研究。结合音乐作品、音响等本体研究的实践性成果,显得不足;结合中国现实生活实践的实践性成果,更是缺乏。中国音乐美学如何沉到音乐的根部,与具体的文化情境相接通,避免始终停留在抽象的泛理论层面,是必须面对的另一个问题。三、对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研究缺乏深入的研究成果,研究队伍日渐减弱。如何培养一个好的学术梯队,是当下亟须解决的问题。四、现代性视域下的美育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有关美育心理学、美学方法论问题的研究较为欠缺。

——杨和平:《新中国音乐美学研究60年》,原载《黄钟》2011年第4期

时评

## 80后文学急需批评引领

傅逸尘

与父辈们相比,80后作家的生活无疑是富足而多彩的,但是,与波澜不惊的新世纪主流文坛相比,80后文学则是喧嚣甚或浮躁的。这肯定跟市场、商业炒作及媒体炒作有关,但80后作家自身的写作焦虑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80后文学的发展缺少真正的文学批评的关注,更不要说主流文坛的认可;在纯粹的文学意义上,80后文学既没有对话者,也缺少明晰的文学性的发展方向。在这样的环境里生长起来的80后文学,先天营养不足是可想而知的。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一度产生影响的70后文学,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其声势明显暗淡了不少,继之而起的80后文学在新世纪文坛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引发了持久的争议。事实上,这种以作家的年龄阶段概括和划分文学群体特征的做法,以与时间或政治事件概括和划分文学史一样,显示了文学批评研究及话语的无力。我们的文学思维和批评观念几乎完全被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所笼罩,而这些批评方法并不能有效地统摄新生代个性化、多元化的文学现象。于是,出版商与媒体合谋,将传统文学批评挤出了80后文学的狂欢场域。如果说文学批评界对6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作家群体的划分与命名尚含有某种学理合法性的话,对80后文学的命名则明显地反映出文学批评界因批评的焦虑所产生的暧昧与含混。

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出版商与媒体对80后文学的青睐与推崇,并非基于对80后写作的文学意义的认同,而是将目光瞄向了其背后的庞大的文化市场和强大的消费能力。以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李傻傻、春树、胡坚、孙睿、笛安等为代表的80后作家在图书市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却始终没能得到主流文学批评界的认可。在相当长的时间段

内,被市场裹挟的80后文学依托着市场运作的强大动能,撇开主流文学批评的规训,游离于主流文学体制之外,呈现出非规范发展的状态。

深陷消费主义泥潭,被市场钳制的80后文学,长期悖离文学自身发展规律,始终处于文学与市场的错位状态。很多80后写手们在“出名要趁早”的现实利益驱动下沦为出版商的盈利工具。可以说,抄袭和模仿之风的蔓延,同质化趋向和模式化写作,极大地抹杀了80后创作的文学成就。媒体炒作的强势与便利,也在很大程度上消弹了80后作家们对文学性的探索与追求。曾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80后作家春树,凭借着一部半自传体小说《北京娃娃》一炮走红,并成为各种媒体的宠儿。频繁的曝光,不断的采访,猎奇性的炒作与宣传,极大地提高了作家的知名度,也使得作者被牢牢圈在了媒体炒作对其创作所作的定位之上。名利场上的迅速崛起之后,却是文学上的长久沉寂,多年来其创作了无新意,难见突破。如果说80后写手模仿他人、迎合炒作、亲和受众的做法,是市场化运作的客观需要的活,部分80后作家对纯正文学立场和高贵文学理想的弃守,对艺术个人忧虑。

与之相对应的,主流文学批评界对80后文学态度冷漠,更多的批评家采取了一种高高在上、冷眼旁观的态度。大而化之,提些不痛不痒的意见是远远不够的,真正需要的是严肃而有效的、对80后文学创作有指导意义的有分量的批评文章。80后文学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种种缺陷和不足,迫切地需要文学批评的引领,经历了市场洗礼的80后文学急需建立一个完整而健全的文学生态环境。